

# 农村老人主观幸福感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 ——基于山东、河南、陕西三省农户调查数据分析

李 越<sup>1</sup> 崔红志<sup>2</sup>

**内容提要：**让老人生活幸福、安享晚年是各项老龄政策的最终目标。本文基于山东省、河南省和陕西省 111 名农村老人的福利调查数据，系统分析了农村老人的主观幸福感及其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从总体上看，农村老人的主观幸福感较强，但同时存在着群体性差异。农村老年人主观幸福感较高并不能掩饰其客观生活质量较差的事实，“多子”也不一定意味着“多福”。基于此，本文从居住空间、代际关系、医疗保障、社会保障、文化服务等几个方面为改善农村老人的生活质量，提高其主观幸福感提出了建议。

**关键词：**农村 老年人 主观幸福感 影响因素 实证研究

拥有幸福的晚年生活不仅是每个人心中的美好愿景，也是各项老龄政策的最终目标。要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了解老年人的福利现状和需求基础，进而探究其幸福感形成的机理和影响因素。随着社会转型步伐的加快，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愈加凸显，十八大报告中更是将“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提升到国家未来长期战略任务的高度。在广大农村地区，人口流动引发的农村空巢老人问题、依然存在的城乡差别以及尚不完善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使得农村老人面临着比城市老人更加严峻的养老压力。据世界银行报告显示，到 2030 年，农村老年人口抚养比将达到 34.4%，城镇地区则为 21.1%。中国农村地区的老龄化速度将快于城镇地区，且未富先老的问题在中国农村比在城镇更突出。近年来，一系列老龄政策密集出台，农村老人则是这些政策关注的重点。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本文将研究的目光聚焦于农村老年人，基于对山东、河南、陕西三省的实地调研，对农村老人的福利现状及特点进行概况总结，探究提高农村老人幸福感的有效途径。本文结构安排如下：第一部分是对国内外相关研究的综述；第二部分提出本文的研究方法和假设，同时说明数据来源；第三部分对理论上的农村老人主观幸福感的决定因素进行单因素分析，以验证该

\*本文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中国农民福利研究”的阶段性生活成果。

因素是否会显著影响农村老人的幸福感，并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其幸福感；第四部分是对实证分析结果的讨论；第五部分是基于实证分析，探索改善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可行路径。

## 一、文献综述

长期以来，人们总希望能够找到打开幸福之门的钥匙。传统的效用理论认为，经济发展和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是人们获得幸福的源泉。然而，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发现经济收入与幸福感之间的关系远非如此简单。Easterlin（1974）指出收入和幸福感的正向相关关系也仅能被面板数据证实，而不能被时间序列数据所证实，说明绝对收入对幸福感的影响是有限的。自此以后，越来越多的学者尝试着从个人人格、心理机制等角度阐释幸福感的形成。Michalos（1985）归纳了六种影响个体主观幸福感的差距解释理论，包括：目标——现实差距理论（个人已有与个人所追求的目标的差距）、理想——现实差距理论（个人已有与社会公认标准的差距）、期望——现实差距理论（个人已有与可能得到的最佳水平的差距）、最佳体验参照理论（与过去最佳的差距）、社会参照理论（与相关个人或群体的差距，又称相对剥夺理论）、个人——环境拟合理论（个人的某一主观特质与所处环境的特质的差距）。

一些研究表明，年龄与幸福感之间呈现“U”字型关系（Oswald, 1997, Blanchflower, 2000b; Dolan et al., 2008），也即老年人是主观幸福感较强的群体。Stroebe(1987)对此的解释是：老年人的期望与抱负相对较低，如老年人认为不再工作以及鳏寡孤独是意料中事，因而当老年人经历类似的事情时，其痛苦相对较轻。Campbell（1995）、Converse（1996）等人的研究认为，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人会不断调整自己的目标，使之更切合实际<sup>①</sup>。此外，老年人更加了解如何调节和控制消极事件对自己的影响。作为社会的动物，社会关系对于个人幸福存在正面的溢出效应。无论是家庭、朋友还是同事，人们都能从与他人共同渡过的时间中获得乐趣，通常与他人一起进行活动会有更强烈的满足感（Kahneman and Krueger, 2006）。但也有研究表明，老年群体报告的与朋友聚会的可能性小得多，他们面临的社会孤立风险较高（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2012）。

国内对主观幸福感的研究起步较晚，但以老年人对象的研究是国内幸福感研究较早涉足的领域。现有研究大多认同中国老人主观幸福感较高的观点。影响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因素多集中在个人性格、健康状况、家庭生活、社会支持等方面（邢占军，2003；吴振云，2003；唐丹等，2006；李德明等，2006；吴捷，2008）。此外，性别、文化程度等因素也会影响到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在农村老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方面，经济状况、子女孝顺程度的重要性在多项研究中被反复提及（梁渊等，2004；张义帧，2010；杨人平和康小兰，2011；吴菁和黄慧敏，2013）。

对已有文献的梳理表明：农村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研究已经进入到初步类型化研究的阶段，关注的重点集中在农村老人的健康状况、经济状况、代际支持、社会联系、性格和心理特征等方面；但同时，现有研究仍然比较薄弱，表现为缺乏系统的分析框架，研究范围往往局限于某一特定地区，没有将区域间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差异纳入研究模型中。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宽了农村老人主观幸福感研究的深度和广度，表现为：一是在分析框架的确定上，既延续了学术界主观幸福感研究中较常用的评价维度（影响因素），又设计了与农村老人特点相适应的评价维度；二是在分析方法上，遵循了“单因素——多因素”的分析路径，分析方法更为严谨；三是利用东中西部三省的数据，将区域差异因素纳入研究范围，弥补了现有研究的不足。

<sup>①</sup>转引自[瑞士]布伦诺·S·弗雷、阿洛伊斯·斯塔特勒：《幸福与经济学——经济和制度对人类福祉的影响》[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

## 二、研究方法、假设与数据来源

### （一）研究方法

根据已有研究的成果及相关理论，本文将影响农村老人主观幸福感的因素归纳为基本变量、健康状况变量、经济状况变量、社会支持变量、社会比较变量五大类。此外，为了考察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地区差异，将地区变量纳入考虑范畴。基于此，农村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函数可表述为：

$$SWB_i = f(X_1, X_2, X_3, X_4, X_5, X_6) + \varepsilon_i$$

其中： $SWB_i$  表示第  $i$  个受访者的主观幸福感； $X_1, X_2, X_3, X_4, X_5, X_6$  分别代表上述六类可能影响农村老人主观幸福感的变量； $\varepsilon_i$  是随机扰动项。

在主观幸福感决定因素的研究方法方面，主要存在两种研究取向：一是把主观幸福感视为连续变量，进而采用 OLS 估计方法分析相关因素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二是将主观幸福感视为定序变量，进而采用有序 Probit 或 Logit 模型来估计主观幸福感决定因素的作用。事实上，相关研究显示，对于 7 点尺度以上的定序变量与连续变量的统计分析结果差异不大。因此，本文将采用第一种研究方法，首先做单因素分析，分别检验各类变量对农村老人主观幸福感的贡献，接着再以 OLS 估计方法检验各变量对主观幸福感的作用。

### （二）研究假设

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本文提出研究假设如下：第一，农村老人的主观幸福感总体上处于较高水平，究其原因，在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形成的过程中，其过去的经历作为参照发挥了明显的调适作用。第二，农村老人的主观幸福感会因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健康状况的不同而有所差异。其中，健康状况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会比对年轻人的影响更显著。第三，家庭经济状况对农村老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并不完全与经济状况本身正相关，还与受访者的预期负相关。第四，代际关系与农村老人的生活状况及幸福感关系密切。本文假定代际关系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子女的数量、对老人的生活照料和经济供养三个方面。受“多子多福”的传统思想影响预期子女数量，特别是儿子的数量与老年人主观幸福感成正比，能得到子女经济和精神支持的老年人主观幸福感会相对较高。第五，乐于参加社会活动、与他人互动较多的老年人更加幸福。第六，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适宜的保障水平有利于提高农村老人的主观幸福感。第七，农村老人主观幸福感的形成不仅与其客观福利状况相关，还受到所选择的参照对象的影响。与参照群体比处于优势地位会提升受访者的幸福感，反之则会降低其幸福感。第八，考虑到东中西部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差异，预期东、中、西部农村老人的主观幸福感呈递减趋势。

### （三）数据来源

本文所用数据来源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中国农民福利研究”项目在山东、河南、陕西三省的入户调查。所调查的 487 个样本中，60 岁以上老年人 111 名，占样本总量的 22.98%。受访老人以男性、已婚和身体健康者居多，平均年龄 65.96 岁，年龄最高者为 84 岁。

## 三、主观幸福感决定因素的单因素分析

### （一）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统计描述

生活满意度是目前学术界公认的衡量个体主观幸福感的关键指标，它指个人依照自己选择的标准对自己生活状况的总体性认知评估。为了考察农民的主观幸福感，我们请受访者对自己的生活及

生活的几个主要方面打分。满意度评价采取十分制，1分代表最低，10分代表最高。同时，我们对受访者的打分按五分法归类，将农民对生活的满意程度分为非常满意（9~10分）、比较满意（7~8分）、一般（5~6分）、比较不满意（3~4分）、非常不满意（1~2分）。

从总体调查结果看，受访老人对自己目前的生活满意度较高，生活满意度评分的均值达到7.99分，比483名受访者整体生活满意度的均值高0.67分。其中，对目前生活满意和比较满意的老人占总样本的81.7%，仅有3.6%的老人对目前的生活比较不满意，没有老人对目前的生活非常不满。

表 1 受访老人生活满意度的统计结果

	均值	非常满意 (%)	比较满意 (%)	一般 (%)	比较不满 (%)	非常不满意 (%)
总体	7.99	37.2	44.5	14.5	3.6	0.0
山东	8.37	53.7	26.8	19.5	0.0	0.0
河南	7.92	35.9	46.2	12.5	5.2	0.0
陕西	7.57	16.6	66.7	10.0	6.6	0.0

从不同区域的情况来看，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变化，东、中、西部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依次降低。其中，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山东省，受访老人的生活满意度均值8.37分，比河南省、陕西省分别高出0.45分、0.8分，且与陕西省受访老人的满意度评分在统计上有显著差异；同时，在山东省，超过一半的受访老人对自己的生活非常满意，该数值比河南、陕西两省分别高出17.8%和37.1%，并且没有受访老人对自己的生活表示非常不满或比较不满。

（二）健康状况变量与主观幸福感

健康是老年人晚年生活质量的重要保证。从睡眠质量、是否有疼痛感、是否有疲劳感等指标的统计结果看，63.7%的老人在不同程度上需要依赖药物治疗以保证日常活动，近四成的老人受到长期慢性病的困扰。从老年人自我报告的身体健康状况看，44.7%的老年人认为自己身体很健康，对自我健康状况的满意度评分为 6.97 分。

除了身体健康状况之外，老年人的精神健康状况也值得关注。虽然半数以上的老年人在生活中获得的满足感、安全感较强，也较少有消极、孤独的感觉，但仍有 10%左右的老年人常处于孤独、消极的状态中，这部分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只有 7.15 分，显著低于老年群体的平均水平。

（三）经济状况变量与主观幸福感

在传统经济学理论中，收入水平一直被视为是影响个体效用进而主观福利的关键性因素。本文选取了家庭人均纯收入、家庭人均消费以及期望/现实收入比三个变量来反映个体的经济状况。需要说明的是，为了考察受访者对收入满意度的个体标准，我们在问卷中设计了诸如“你们家年收入达到多少万元你觉得就很满意了？”、“低于多少万元你觉得日子就紧了？”等一系列问题。这种“收入评价问题”（IEQ）模式最初由 Van Praag（1971）年提出，而后被莱登学派广泛使用，其优势是在分析中体现了受访者所持评价标准的差异性（范普拉格，2009）。进一步，我们将所获得的个体期望收入的标准与其实际收入相除，得到的期望/现实收入比以反映两者之间的差距。

表 2 经济状况与主观幸福感

	人均纯收入（元）	人均消费（元）	期望/现实收入比
非常满意	10971.4	5986.5	1.7
比较满意	7265.1	4707.0	2.2
一般	6623.1	4666.7	2.9

农村老人主观幸福感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比较不满意	3089.0	1550.0	3.9
总体	8396.2	5081.7	2.1

注：由于没有受访者生活满意度评分为非常不满意，因此本表略去未列。

统计数据表明，随着满意度评价等级的降低，该群体的家庭人均纯收入和人均消费水平均值也依次降低，并且对生活非常满意的群体的上述两项经济状况指标分别是对生活比较不满意群体的3.55倍、3.86倍。与此同时，现实收入与期望收入的差距却随着满意度评价等级的降低而扩大，说明主观幸福感与期望/现实收入比负相关。

对于农村老人来说，其目前主要的经济来源有：自我保障（劳动收入、个人积蓄等）、子女保障（子女转移支付）和社会保障（退休金、养老金等）。从统计结果看，近半数的老年人能够得到子女的赡养；依靠社会保障养老金生活的老年人幸福感最强，特别是那些仅依靠养老金就能基本满足日常生活需求的老年人，其满意度得分高达8.38分。

表3 养老经济来源

		个人积蓄	个人劳动	子女	养老金
仅有	频率	3	12	19	16
	占比（%）	2.8	14.3	17.2	22.4
	满意度	8.00	7.08	8.05	8.38
包含	频率	13	34	54	23
	占比（%）	11.7	30.6	48.2	20.4
	满意度	7.9	7.5	7.9	8.4

虽然依靠养老金养老的方式更有利于农村老人主观幸福感的提高，但现阶段，农村老人社会保障资源还较为匮乏，仅有五分之一的受访老人将养老金作为其养老经济来源，多数老人仍处于依靠自我养老、子女保障的模式。

（四）社会支持变量与主观幸福感

子女是老年人晚年生活的重要依靠，也是老年人社会关系中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在调查中，受访老人平均有子女2.72个，平均有儿子1.45个。62.8%的老人能从子女处得到钱或实物，平均金额为2165.3元/年；13.0%的老人所得的钱或实物折价后不超过1000元，很难称得上得到了“赡养”。

表4 与子女的联系频率

	变量描述		单变量影响	
	占比（%）	幸福感均值	系数	T值
常量			8***	19.6
住一起（参照）	15.2	8	—	—
每天联系	14.4	8.4	0.08	0.64
每周联系	36.9	8.1	0.021	0.151
每月联系	20.7	7.8	-0.043	-0.323
没事不联系	12.6	7.5	-0.09	-0.745

注：\*\*\* 表示  $p < 0.01$ 。

除了经济赡养之外，子女在老年人生活照料和情感支持方面的作用是无可比拟的。目前，单独居住仍是老年人主要的居住方式，只有15.2%的老年人和子女生活在一起。不与子女生活在一起的

老年人与其子女的联系频率对其主观幸福感有重要的影响。统计数据显示,超过 50%的老年人能保证每周都与子女联系,老年人的满意度评分随着与子女联系频率的降低而递减。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如果将与子女共同生活的老年人也纳入比较范围则会发现,作为与子女联系频率最高的共同生活模式却并不是令老年人幸福感(8 分)最强的生活模式,反而是单独生活但能每天都与子女联系的老年人幸福感(8.4 分)最高,甚至只要保证每周至少联系一次,单独生活的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8.1 分)也会高于与子女共同生活的老人。但是,如果联系的频率过低(例如每月至少一次或没事不联系),独居老年人的幸福感则会不如与子女共同生活的老年人。由此可以看出,老年人既需要子女的关怀,也需要有自己相对独立的生活空间。

(五) 社会比较变量与主观幸福感

1.横向社会比较。社会比较是指人们将自己的能力、感觉、境况、观点等与别人进行比较的过程(Festinger, 1954)。问卷中设计了社会比较的相关问题,如“与你亲朋好友/村里人/城里人比,你觉得你过得如何?”等,并请老人们在回答完每个问题后分别陈述原因。调查结果显示,半数以上的老人认为自己与同村人相比生活过得差不多,还有 20%左右的老人认为自己的生活比同村人更加优越。与亲友比的结果和与村里人比的结果较为相似,这是由于农村社会本身就是以血缘为纽带,农民的亲友也多生活在本村。与城里人比较的结果却有所不同,76.9%的老人清楚地感受到了差距的存在,并且 45.4%的老年人表示这种差距不仅是“差一点”而是“差很多”,只有不足 10%的老人觉得自己生活得比城里人好一点或好很多。

表 5		生活满意度的参照群体及参照效应			
	系数	T 值		系数	T 值
常量	8.401***	19.909	比同村人差	-0.313***	-2.954
比亲友好	0.104	1.072	比城里人好	0.131	1.232
比亲友差	0.031	0.293	比城里人差	-0.111	-1.032
比同村人好	0.047	0.475			

注:\*\*\* 表示  $p<0.01$ 。这里将与目标群体社会比较的结果归为“比目标群体好”、“与目标群体差不多”、“比目标群体差”三类设置虚拟变量。

与社会比较密切相关的是参照群体,该概念最早由 Hyman (1947) 在研究社会地位问题时提出,其基本思想是个体在自我评估和形成态度时会受到他人行为和标准的影响,其中某些人的影响比其他更大,这些对我们有相当影响的个体组合就被称为社会参照群体<sup>①</sup>。用来做来参照的群体既可以是实际的,也可以是想象中的(Webster and Faircloth, 1994)。表 6 反映了与亲戚朋友、同村人和城里人三类人群的社会比较结果与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关系。结果显示:首先,社会比较结果与生活满意度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即当个体认为自己在社会比较中处于优势地位时,其生活满意度往往也较高,反之则较低;其次,虽然与上述三类群体的比较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形成都有影响,但只有与同村人的比较对满意度的影响在统计上显著,这说明老年人满意度形成过程中的参照范围十分狭窄,他们真正的参照群体仅仅是同村的农民;最后,参照群体对个体满意度的影响存在着不对称,即当个体自我感觉生活状况优于参照群体时,两者间的差距对其满意度造成的影响不如当个体自我感觉生活状况处于劣势时。具体而言,当老年人感到自己的生活不如同村人时产生的痛苦会比

<sup>①</sup>转引自[美]迈克尔·赫斯和卡洛琳·克雷勒:《社会学导论》[M],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2 年 6 月。

当他认为自己的生活比同村人好时产生的快乐更强烈。

2.纵向自我比较。进入 21 世纪以来，我国农村公共事业发展的政策取向发生了重大的调整和转变，国家财政投入“三农”的力度不断加大。近年来，各项支农惠农政策，特别是与老年人利益密切相关的农村政策密集出台，极大地改善了农村老人的福利状况。因此，66.7%的受访老人感到现在的生活比五年前好多了，27.0%的老人感到生活比五年前好一些，只有不到 10%的受访老人感到生活没太大变化（甚至在走下坡路）。同时，近年来，农民生活的明显改善也增强了老人们对未来生活的良性预期<sup>①</sup>，60%的受访老人认为五年后的生活将比现在好一些或好很多，6.3%的老人认为变化不会太大，只有不到 5%的老人对未来预期较为悲观。此外，还有 28.8%的老人认为生活中存在着一定的不确定性，因而很难对未来形成明确的预期。

表 6	自我比较与幸福感的 Pearson 相关性检验	
	满意度	
	相关性	显著性（双侧）
与五年前比	0.232*	0.015
与五年后比	0.229*	0.016

注：\*表示在 0.05 的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表示在 0.01 的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Duesenberry（1949）强调：人们的幸福感评价会以往期收入和消费水平为参照，该特征在受访老人幸福感（满意度）形成过程中表现得十分明显。生活满意度与“与五年前比”、“与五年后比”两类自我比较变量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说明比过去的生活水平提高了以及对未来生活的良好预期能显著增强老年人目前的生活满意度。在调查中，老人们对近年来党的政策赞不绝口，他们相信在党的领导下，未来的生活将越来越好。

四、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决定方程

在单因素分析的基础上，本文将 6 大类指标、19 个变量纳入模型中进行分析。各变量赋值及基本描述见下表。

表 7	变量处理与分布	
	定义	均值或占比（%）
因变量		
主观幸福感	满意度评分 1~10	7.99
自变量		
1.基本变量		
性别	男=1；女=0	79.3
年龄	岁	66.23
受教育年限	年	5.63
未婚虚拟	未婚=1；已婚或丧偶=0	4.5
丧偶虚拟	丧偶=1；已婚或未婚=0	5.4
2.健康状况变量		

<sup>①</sup> “与五年前比”和“与五年后比”两变量间相关性在 0.05 水平上显著。

## 农村老人主观幸福感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身体健康	不依赖药物=1; 需要药物=0	36.4
心理健康	根本不孤单=1; 有孤单感=0	59.1
3.经济状况变量		
家庭人均纯收入	元/人	7897.69
家庭人均生活消费	元/人	5081.66
期望/现实收入比		2.14
是否享受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	享受=1; 否=0	72.6
子女是否给钱或物	是=1; 否=0	69.6
4.社会支持变量		
子女数量	个	2.72
儿子数量	个	1.45
(续表 7)		
是否与子女住一起	是=1; 否=0	16.8
是否与子女联系密切	单独生活或每周联系=1; 否=0	51.3
是否参加各类社会组织	是=1; 否=0	41.4
5.社会比较变量		
比同村人好	是=1; 一样或较差=0	18.9
比同村人差	是=1; 一样或较好=0	25.1
比五年前好	是=1; 不变或变差=0	93.7
预期变好	是=1; 不变、变差或说不好=0	60.9
6.地区变量		
山东虚拟	山东=1; 河南或陕西=0	36.9
河南虚拟	河南=1; 山东或陕西=0	30.0

本文将生活满意度看作连续变量,用 OLS 法进行试验性逐步回归,得到的结果见下表。

表 8 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决定因素的 OLS 估计结果

	估计系数		估计系数
常量	2.568	4.代际关系变量	
1.基本变量		子女数量	0.120
性别	-0.211 <sup>*</sup>	儿子数量	-0.62
年龄	0.110	是否与子女住一起	-0.124
受教育年限	0.081	是否与子女联系密切	0.192
未婚虚拟	-0.243 <sup>**</sup>	是否参加各类社会组织	0.173 <sup>*</sup>
丧偶虚拟	-0.090	5.社会比较变量	
2.健康状况变量		比同村人好	0.222
身体健康	-0.224 <sup>**</sup>	比同村人差	-0.157 <sup>**</sup>
心理健康	0.231 <sup>**</sup>	比五年前好	0.181
3.经济状况变量		预期变好	0.056
家庭人均纯收入	0.153	6.地区变量	
家庭人均消费	0.221	山东虚拟	0.212 <sup>**</sup>



农村老人主观幸福感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期望/现实收入比	-0.188*	河南虚拟	0.346
子女是否给钱或物	0.076	R <sup>2</sup>	0.413
是否享受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	0.098	F	2.016**

注：\*表示  $p<0.1$ ；\*\*表示  $p<0.05$ ；\*\*\* 表示  $p<0.01$ ；自变量相关矩阵显示，自变量间两两相关性较弱，限于篇幅，本文省略相关矩阵。

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决定因素的 OLS 估计结果表明：

第一，在基本变量中，主观幸福感存在性别差异，老年女性的幸福感显著高于男性；年龄的增长和受教育程度的提高都会提高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但作用不显著；相较于已婚者，终身未婚或丧偶的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相对较低，特别是终身未婚者，其幸福感显著低于已婚者。

第二，以“日常生活是否需要依赖药物”和“生活中是否有孤单感”为代表的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变量的估计结果表明，身心健康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形成有显著影响。身体健康状况较差、常年依赖药物的老年人，其主观幸福感的对数较身体健康的老人低 0.224。类似地，生活中会感到孤单的老人，其生活满意度的对数比没有孤单感的老人低 0.231。

第三，以家庭人均纯收入、家庭人均消费提高所表征的家庭经济状况的改善有助于提高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但影响不明显；与此同时，期望收入与生活满意度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期望与现实收入比每扩大 1 倍，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将下降 0.188。

从老年人养老的经济来源来看，以社会保障作为主要养老经济来源的老年人，其主观幸福感明显高于依靠自我保障、子女保障的老年人。本文以农村地区普惠性的养老金制度——新农保为代表分析了社会保障制度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结果表明，有 72.6% 的受访老人已经享受到新农保养老金，享受新农保养老金的老年人生活满意度高于未参保的群体，新农保制度在提高老年人主观幸福感方面已经开始发挥积极作用。但这种积极作用目前表现得并不明显，其主要原因在于：一是现阶段的人均养老金水平仅为 55.2 元/月，保障水平较低，尚不能满足老年人的养老需求；二是我们在调查中发现，一些老人的新农保养老金被计入家庭总收入的一部分，并不由老年人自行支配，因而它对改善老年人生活质量的作用表现得不明显。

第四，考察老年人的社会联系与其主观幸福感的关系时可以发现，积极参与老年协会、兴趣组织等社会组织的老年人，其生活满意度显著高于未参加此类组织的老年人。可见，积极参与社会交往有利于增进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

与子女的关系是老年人社会关系中最重要部分。回归结果表明，子女数量、儿子数量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并不显著，甚至儿子数量与农村老人的主观幸福感负向相关，也就是说儿子越多，老年人的幸福感反而更低。考察老年人与子女的联系时发现，与子女共同生活或是提高与子女的联系频率以及得到子女经济上的赡养可以增进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但是，从提高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角度看，与子女共同生活似乎并不是最优的养老生活方式。

第五，在横向社会比较中，由前文的分析可知，同村人是农村老人的参照群体，因此，本部分仅将该群体纳入参照系。结果表明，感觉自己生活比同村人好可以提高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但作用不显著；而感觉自己生活比同村人差会显著降低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纵向自我比较中，当老年人感到生活比过去有所改善以及预期未来生活会向更好的方向发展时，其幸福感都会有相应地提升。

地区变量方面，在处于东部沿海地区的山东省，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显著高于处于西部地区的陕西省，这说明东西部的经济差异会影响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

## 五、主要结论与启示

本文基于山东省、河南省和陕西省 111 名农村老人的福利调查数据，系统分析了农村老人的主观幸福感及其影响因素。实证研究的主要发现及相关启示如下：

第一，从总体上看，农村老人的生活满意度较高、主观幸福感较强，但这并不表示其生活条件也达到相应较高的水平。农村老人较高的幸福感主要源自社会比较倾向弱、仅仅以过往的收入和消费为参照系、以及对近年来国家惠农政策的认同和对未来的美好预期。因此，政府在政策制定时，应看到农民较高的主观生活质量并不完全是由客观生活质量的改善所形成的，不该因为老年农民主观生活质量较高而放松甚至忽视改善老年农民的客观生活质量。同时，由于老年农民较高的主观生活质量的形成与近年来国家的惠民政策以及对未来的美好预期有直接关系，如果想继续保持以及提高老年农民的主观生活质量，就需要不断完善惠农政策、尤其是瞄准农村老年人的惠农政策。

第二，有悖于“多子多福”的传统认识，子女数量的增多并没有带来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显著提升，尤其是家中儿子数量增多反而会造成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降低。究其原因：一方面，按照多数农村地区的传统，婚娶费用如建房、聘礼等主要由男方承担，家中儿子越多，父辈经济压力相应就越大；另一方面，随着农村男性青壮年劳动力的外出务工，“养儿防老”的社会经济基础趋于瓦解，真正担负起照顾父母责任的反而是外嫁的女儿。

第三，居住安排是老年人晚年生活的重要内容。实证研究发现，与子女共同生活并不是最理想的居住安排模式，独立的生活空间对提高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而言是十分必要的，原因是两代人在生活习惯上存在客观的差异。许多老年人表示，“和年轻人吃不到一块去”，共同生活容易因生活琐事引发摩擦。更为理想的居住安排模式是老年人拥有独立的居所，并能时常与子女保持联系、互动。

第四，健康是老年人生活质量的核心和基础。调查显示，虽然受访老年人身体健康状况尚可，但多数老人都或多或少地需要一些药物维持日常生活，并且有相当比例的老人长期受到慢性病的困扰。然而，许多慢性病药物并不在新农合报销药物范围之内，从而给这些老年人造成了沉重的经济负担，也导致部分老人有病不治而使病痛折磨加剧。针对老年人健康问题的特点，应考虑提高新农合中老年人常用慢性病治疗药品的报销范围和比例，健全与老年人实际医疗需求相匹配的医疗保障体系。

同时，健康的含义不仅指身体的健康，老年人的心理健康需求同样值得重视。相较于身体健康，心理健康状况对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有更为直接的影响，但心理健康问题在日常生活中的表现却较为隐性，因而极易为人们所忽略。特别是在经济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城镇化引发的农村留守老人的精神赡养问题、现代住宅方式造成的老年孤独问题等，使得农村老人的精神需求问题更加凸显。在这样的背景下，一方面应该强调并发扬传统孝文化以及尊老敬老等社会美德；另一方面要致力于丰富老年人的文化娱乐生活，健全老年人公共文化体育设施的配套，鼓励老年协会等组织发展。此外，还要加强对空巢老人、五保老人等特殊群体的精神关怀。

第五，注重村庄内部分配公平和老年人利益保障。实证研究发现，参照群体的参照效应对老年人幸福感的形成有重要影响。通常，老年人仅以同村村民作为参照对象，狭窄的参照群体是其主观幸福感较高的原因之一。同时，与参照群体进行社会比较的结果对老年人幸福感的影响是不对称的，当老年人处于相对剥夺地位时，其主观幸福感将有显著的下降。因此，农村社会政策制定时应特别注意村庄内的分配公平，秉持“最大最小化”原则的分配政策和制度安排更有利于提高老年人整体福利水平的原则。

第六, 加强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建设, 提高新农保养老金的保障水平。长期以来, 中国农村地区的老年人主要依靠个人劳动和子女赡养维持晚年生活, 这会给老年人带来身体和心理上的负担。调查显示, 当养老金可以成为老年人主要的养老经济来源时, 可以观测到其主观幸福感的提升。但目前, 社会养老方式还没有成为农村主导的养老保障模式。虽然新农保制度已经在 2012 年实现了地区全覆盖, 但其“保基本”的政策目标决定了新农保养老金很难满足老年人的养老经济需要。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 传统养老方式的脆弱性逐渐凸显, 由此也对政府的社会养老责任提出了更高、更紧迫的要求。因此, 政府应该将逐步提高新农保养老金保障能力作为未来政策的目标, 解决农民养老的后顾之忧, 提高农村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

#### 参考文献

- 〔1〕 Easterlin, Richard, A.: Does Economic Growth Improve the Human Lot? Some Empirical Evidence. In: David, Paul A. and Melvin W. Reder (eds.): Nations and Households in Economic Growth: Essays in Honor of Moses Abramowitz, NY: Academic Press: 89-125, 1974.
- 〔2〕 Michalos, Alex C.: Multiple Discrepancies Theory,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No. 16, 1985.
- 〔3〕 Oswald, Andrew J.: Happiness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Economic Journal, Vol.445, No.107:1815~1831, 1997.
- 〔4〕 Blanchflower, David G., and Andrew J. Oswald: Well-being over Time in Britain and the USA, NBER Working Paper, No.7487, Cambridge, Mass.: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2000b.
- 〔5〕 Stroebe, Margaret S., Wolfgang Stroebe.: Bereavement and Health: The Psychological and Physical Consequences of Partner Los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 〔6〕 Daniel Kahneman and Alan B. Krueger: Developments in the measurement of subjective well-being,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0:3-24, 2006.
- 〔7〕 Bernard M. S. Van Praag and Paul Frijters, The measurement of welfare and well-being: The Leyden approach,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 Discussion Papers and Working Papers Series, 1999.
- 〔8〕 Festinger, L.: Informal social communication, Psychological Review, 57:271~282, 1954.
- 〔9〕 Webster C. and Faircloth III, J B.: The role of Hispanic ethnic identification on reference group influence, Advances in Consumer Research, Vol. 21, No.1:458-463, 1994.
- 〔10〕 Duesenberry, James S.: Incomes, Savings and the Theory of Consumer Behavior, Cambridge: University of Harvard Press, 1949.
- 〔11〕〔瑞士〕布伦诺·S.弗雷、阿洛伊斯·斯塔特勒:《幸福与经济学——经济和制度对人类福祉的影响》,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年。
- 〔12〕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民生问题: 衡量社会幸福的 11 个指标》, 新华出版社, 2012 年。
- 〔13〕〔荷〕伯纳德·M·S·范普拉、埃达·费勒-i-卡博内尔:《幸福测定——满足度计量方法》, 格致出版社, 2009 年。
- 〔14〕〔美〕迈克尔·休斯、卡洛琳·克雷勒:《社会学导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12 年 6 月。
- 〔15〕邢占军:《中国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量表在老年群体中的应用》,《中国老年学杂志》2003 年第 10 期。
- 〔16〕吴振云:《老年心理健康的内涵、评估和研究概况》,《中国老年学杂志》2003 年第 12 期。
- 〔17〕唐丹、邹军、申继亮和张凌:《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06 年第 3 期。
- 〔18〕李德明、陈天勇、吴振云、肖俊方、费爱华、汪月峰、周林古和张放:《城市空巢与非空巢老人生活和心理状况的比较》,《中国老年学杂志》2006 年第 3 期。

- 〔19〕 吴捷：《老年人社会支持、孤独感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中国老年学杂志》2008 年第 4 期。
- 〔20〕 梁渊、曾尔亢、吴植恩、李谨邑、卢祖洵和陈仲文：《农村高龄老人主观幸福感及其影响因素研究》，《中国老年学杂志》2004 年第 2 期。
- 〔21〕 杨人平、康小兰：《农村老人主观幸福程度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江西农业大学学报》2011 年第 33 卷。
- 〔22〕 吴菁、黄慧敏：《农村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及其影响因素研究》，《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13 年 1 月。
- 〔23〕 张义帧：《农村老年妇女主观幸福感及其影响因素研究》，《东南学术》2010 年第 5 期。

（ 作者单位：<sup>1</sup>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信息研究所；

<sup>2</sup>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

（ 责任编辑：白 描）